

# 從日本看台灣的日本研究\*

川島 真

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 一、東亞的日本研究之重要性

進入 21 世紀後的東亞，其人與物的移動，可謂正空前地增加中，一種超越國家的彼此關聯、即一種超越國籍的各種關係在明顯化的同時，另一方面國家主義也在抬頭，而逐漸成為問題。國家間的關係漸趨緊密，超越了「文化交流」和「對話」的時代，而一種對新秩序形成的要求也漸出現，然與此同時，東亞仍殘留著許多僅憑國家間關係的日趨緊密仍無法克服的問題。例如日本對戰爭、對歷史的認識問題，以及朝鮮半島、還有以台灣海峽為隔的國家分裂的問題。在 1940 年代後期，這些問題因冷戰的構造而被凍結，然而隨著冷戰的緩和，這些問題便又相繼浮現，而造成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的緊張。對這些歷史問題若無法順利地培養共識，自然將有礙於新秩序的建立。

特別對日本而言，常被問及：如何認識其戰爭和殖民統治、並如何對之加以說明？此際，日本本身的認識是否被鄰近諸國所理解，及日本對此又是否能夠理解，是很重要的。當然其根本問題其實在於：周圍的鄰國是如何看待日本、而日本又如何想像周圍的鄰國，即對彼此的想像為何的問題。

戰爭前期的日本，擁有自己是東亞的文明國家、並可稱為一方大國的自信，自認居於擁有殖民地的「帝國」的位置。對於世界的認識採取「西洋、東洋與日本」的三分法，對於亞洲諸國所持的觀感，可將之稱為近代日本版的東方主義，是以自身的優越性為前提的。然而，正如同取得殖民地與「大東亞共榮圈」是同時存在的，在設法涵蓋東亞諸地域的過程中，即在內部理論形成的同時卻也發生了差別化的情況。

戰後的日本必須在其四島重新進行國家建設。此為日本失去了其殖民地，

---

\* 本文初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台灣的日本研究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2004 年 5 月 28 日。

同時從海外有數百萬的「日本人」被再度涵攝進來，且又有所謂冷戰構造下與美國成為軍事同盟所享有的各項恩惠。從而其獲得了文明國家＋經濟大國的此一新的自我認同。

然而，在討論戰後的日本對於戰爭前期應該如何加以定位、是否應負起責任時，經歷了一段不算成功的過程。東亞諸國（地區）也正在進行脫離日本而自立、獨立，與克服種種問題的各自的歷程。在此過程中東亞諸國達成了以下的認識：東亞所必須解決的，是相互認識這類困難的歷史問題，而此類問題可謂由來已久。實際上，這些問題附加在日本的戰爭及支配等行為之上，而使得問題的層次更加複雜。

這些問題對於東亞的戰後史、或在構思 21 世紀的東亞時，是無可避免的問題，而考量這些問題的關鍵或許正為「脫殖民地化」。這不僅意謂著台灣等過去屬於日本殖民地的地區如何在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等諸方面均要從殖民地的狀態中「脫出」、或是如何形成其自我認同，同時也是意味著，戰後的日本如何從擁有殖民地的狀態中「脫出」。在此過程中正可看出另有與戰爭及支配同樣重要的「問題的淵源」存在。日本應如何認識其以前的殖民地及支配地？反過來說這些地區又如何認識、理解日本？而彼此間是否已對互相認識、理解的理想方式有所認知？這些根本問題是在思考上述問題時不能不加以考量的。日本在與東亞各國在報章雜誌及電影、音樂、戲劇等方面進行相互交流的時，對於日本的亞洲研究，以及東亞的日本研究應採用如何的方式，確實是應該詳加思考的問題。<sup>1</sup>

## 二、為何須討論台灣的日本研究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大概便可發現「台灣的日本研究」可謂是一非常重要的課題。這是因為台灣經歷了 51 年的日本統治，戰後則由之前與日本進行戰爭、以「抗日」作為國家建設基軸的中華民國加以統治。從日本統治下的「日本觀」出發，便自然地會浮現以下問題：應該如何認識戰後的日本？如何形塑此一包含了大量政治脈絡的「日本」？如此便很容易想像台灣有較南韓及中國更為複雜的背景及經歷。以上所謂台灣的「脫殖民地化」可以藉由「日本研究」

---

<sup>1</sup> 此論點與松金公正、三尾裕子、林美容、黃智慧等於「国際ワークショップ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認識」（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主辦，國際研討會「在台灣發現日本」，2004 年 3 月 27 日）發表論文的設定課題有關。筆者雖不克參加此次研討會，但呈蒙宇都宮大學的松金公正惠賜此本論文集，謹致謝忱。

加以達成，這樣的想法獲得重視，且這樣的作法可以幫助認識彼此、以及發現對彼此應該抱持的觀點。

關於台灣的日本研究已存在多種形式的討論。<sup>2</sup>然而近來，對日本論述的必要性又重新被強調，這可說是以台灣社會的變化為其背景，而此變化又與上述「脫殖民地」的論點有間接的結合。變化之一為台灣對全世界所持的關心正急速高漲，對外國的重新檢視也在展開，並且在國際政治的變動中，也在重新檢視與日本的關係。這些作為一般背景都可說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即使僅以日台自身的關係來看，也存在以下變化：台灣對作為鄰國，又在經濟、觀光、文化方面高度相關的日本的關心的重新提高；以及以往擔負日台關係重任的、所謂「日語人口」的高齡化，將成為今後日台關係的警訊等。在另一方面日本對台灣的關心也急速高漲。<sup>3</sup>現今的日台關係已進入「重新檢視與再構築」的時期，同時伴隨著對前述「脫殖民化」此一問題淵源的提問，日台關係正被熱烈地討論中。

### 三、戰後台灣的日本研究－拙著《台灣における日本研究》中所見的課題

戰後的台灣在中華民國的統治下，由政府對所謂的「日本」在「抗日意識型態」下重新加以建構。要將「台灣」「台灣人」再定位為「中國」「中國人」，「日本」這個符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台灣人對自己作為台灣人的自我認

<sup>2</sup> 對目前為止台灣的日本研究成果加以收集的有如下論文：(1) 蔡茂豐，《台灣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上・下)》(2003)、(2) 徐興慶「現代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研究」(1999)、(3) 徐興慶《我国的日本研究現況及其未来展望—兼談中国大陆及韩国之日本研究現況》(2000) 等文。而日語教育的概況可參見下文：(4) 劉長輝「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研究の現狀と展望」(1997)、(5)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事情調査報告書(改訂版)》(1998)、(6) 拙稿〈日本政府の対東アジア文化交流政策の現狀と課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を事例として〉(川島真 2000)、(7) 拙稿「戦後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研究動向と中国の比較に関する一考察」(川島真 2002b)、(8) 拙稿「台湾の日本研究」(川島真 2003)。另黃智慧有關於近年來此領域的研究報告，雖為口頭報告但已經公開發表。台灣的日語教育方面，國際交流基金會網頁有文獻目錄的登載：<http://www.jpf.go.jp/j/urawa/index.html>。另專書有谷口龍子《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事情調査報告書 1999(改訂版)》(2001)。

<sup>3</sup> 日本對台灣的關心高漲，可由以下方面得見：後殖民(Post Colonial)論述及地域研究中的台灣研究，或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中對台灣抱持高度的學術關心；與伴隨反中情節的高漲、假定的「親台論」的推進二方面。參見拙稿「方法としての台湾」(川島真 2001)。

識形成過程中，也有反而將「日本」置於與「中華民國」相對立的位置，而對其採取肯定的態度。而此一日本的形象與經濟發展、作為近代化模型的日本也相重疊了。從而使中華民國在管理「日本」的同時，也在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漸對「日本」加以開放。然而，其所謂的「日本」形象到底是否完成了？仍不十分清楚。且二國斷交之後反而朝向關係緊密化發展的例子，可謂寥寥可數。

在此狀況下，筆者亦於 2001 年度接受交流協會的委託，調查「在台灣的日本研究」，公開發表了《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研究》（川島真 2002a）一書。此調查的主要內容之一特別為關於日本研究的出版品（碩士論文、博士論文、雜誌論文及部分專書）的目錄編纂。本書的編目工作可謂十分不完整。然而對於僅以三個月寫成而敢為發表，筆者認為仍具有以下意義。

（一）對類似的基礎工作加以著手，雖不完整仍加以發表，以此為起點，今後應可期待逐步完成更加完整的目錄及基本資料的整理，意即，此作品應可視為對「台灣的日本研究」的基礎整備的發端。

（二）「台灣的日本研究」可謂已有充分的蓄積，也培養了一定的人材，即使在「世界的日本研究」中，也應稱得上具有穩固的地位，然而由於日本方面的支援和資訊收集體系的不足，使其無從發出完整的資訊，本書作為「台灣的日本研究」之成果的一部分，雖不完整，仍可提供回流至世界的材料。

（三）以「在台灣的日本研究」與世界各地的日本研究相比較，提供在彼此的相對化中捕捉其面貌的線索。而可期待台灣的日本研究更進一步地和「世界的日本研究」相交流。

（四）在思考日本的對台文化交流的理想方式時，可以作為一種「試案」。此為參考過對本書的批評意見後所形成的想法。

當然本書的不成熟度也很高，也可指出許多問題。

（一）目錄編纂之際，並未將台灣的日本研究中居核心地位的日本語學及日語教育學列為對象。這是出於派遣在台灣的交流協會的日語專家等，預測在此方面的調查應進行得十分頻繁之故，也是出於筆者自身的專業能力與工作進行中的問題。然而，認為台灣的日本研究之主力在日本語學與日語教育學，此看法或許失之偏頗。

（二）全面性。文獻目錄要確保其完整性是十分困難的。碩博士論文以 70-80% 為其限度。另外是關於何謂日本研究的問題，例如，將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史研究置之於外，而日本帝國研究則被包含其中，對此點的分析是十分須要仔

細思索的。

(三) 內容部分的探索不足。台灣的日本研究學界內部亦存在各種內容的研究，本書對此未詳加調查，故而使許多部分難以書寫。故而本書無法作出論述，相反地僅是對純屬於基礎研究的部分加以收集。

然而，對戰後台灣的日本研究相關碩博士論文等研究成果展開調查的結果，發現一個連續演進的過程確實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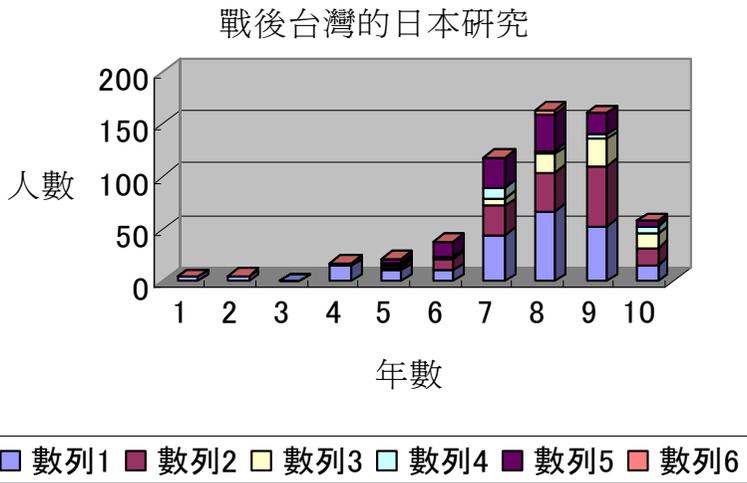


圖 1 戰後台灣的日本研究 碩士論文、博士論文數量

註：年數自 1956 年起，每 5 年為一單位。1 為 1956-1960 年，2 為 1961-1965 年，3 為 1966-1970 年，4 為 1971-1975 年，5 為 1976-1980 年，以此類推。10 僅有 2001 年。條狀部分顯示了各領域。數列 1 為政治外交，2 為經濟管理，3 為社會，4 為文化，5 為人文社會，6 為理科。

於 1970 年代開始，台灣的日本研究從本來的被限定在政治外交方面，其種類開始趨向多元，而在 1980 年代此種趨勢全面地展開，在數量方面，於 1980 年代後半到 1990 年代予人一躍千里之感。而令人深感興趣的是 1972 年斷交前後，學習「日本」的方向趨向多元，漸漸地人文科學及經濟管理的領域也增加了。從而，國民黨的一黨獨裁終了、進入民主化進程、中華民國急速台灣化之後，1980 年代後半到 1990 年代前半，「研究日本」一事也急速地擴展。被管理的「日本」也加以開放了。然而，民主化與台灣化在其深化與固定化的過程中，究竟會對日本採取如何的論述仍為未知數。如果在民主化與台灣化中，對日本

的論述毋寧謂是一種刻意對過去的禁忌加以謳歌的話，今後的日本研究便可謂被置於十分嚴峻的狀態下了。<sup>4</sup>

#### 四、世界的日本研究與台灣的日本研究

上述台灣的日本研究究竟應被置於如何的地位呢？由於沒有正式邦交，台灣的日本研究並不被包括在外務省的外圍團體國際交流基金所作的調查之中，從而「世界的日本研究」的資料中也不含台灣的日本研究。以下希望以國際交流基金所發表的資料為基礎，對台灣的日本研究的定位作一考量。

綜觀世界的日本研究，一般多會對日本研究、日語研究作出如下判斷：歐洲的日本研究擁有自弗洛依斯（Luis Frois）以降五百年的傳統，而可見水準極高的、如對《源氏物語》研究等的深化研究；與此相對的主為戰後獨立的亞洲諸國等，其研究對象為日本的近代化及日本的經營管理等實踐內容。在日語方面，擁有自《日葡辭典》以來的高度傳統的歐洲、與將重點放在對日語的實踐性運用的亞洲，此一對立構圖也被樹立<sup>5</sup>。且日本的日本研究（史學、文學等），又因歐美的日本研究頻頻藉由翻譯而被引介至日本，而給予國內的研究一種強烈刺激。<sup>6</sup>

同時，一般說來日本研究的歷史不長的地區，其研究者分佈的層面單薄，研究又多限於文學及民間傳說，且接受高度社會科學訓練的日本研究者養成困難，因而在其他的社會科學者間，有認為日本研究者難以取得發言權的此一指摘存在。而關於突破此一狀況的方法，則有以下議論出現：支持即使不懂日文、

---

<sup>4</sup> 當然，「地域研究」在學界的變化中佔有何種地位也是很重要的。從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前半，地域研究相較之下較受重視，然而 1990 年代之後在全球化的趨勢中，地域研究這類研究方法自身的許多疑點便被呈顯出來。

<sup>5</sup> 參見「国際交流基金が関わる日本研究支援のあり方に関する提言 世界の日本研究とのかかわりを求めて」此報告是國際交流基金委託石井米雄、神田外大學長等人，於平成 14-15 年度間完成的。其於 16 世紀之前日本歷史的記述中，並未記及中國及南韓等亞洲諸國的中文史料所佔有的地位，或許「並不屬於日本研究」。http://www.jpf.go.jp/j/intel\_j/topics/proposal/pdf/proposal.pdf。

<sup>6</sup> 相較於此，亞洲的日本研究對日本學界所造成的衝擊絕無法謂為多數。即使是在前註的提言中，也僅列舉了如嚴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1991）等二點。然而如黃自進《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與評價 1906-1932》（1995）、黃自進《北一輝的革命情結：在中日兩國從事革命的歷程》（2001），對日本學界也造成話題的亞洲的日本研究在持續增加中。另一方面，如張龍妹《源氏物語の救済》（2000），係以留學生身份赴日、而將日本研究的成果在日本發表，此類例子也開始出現。

但接受過社會科學訓練，可以跟得上歐美的日本研究成果的研究者等。<sup>7</sup>近來日本的對中文化交流的補助對象也不只限於「日本研究者」，也開始將留學歐美的輿論領導者及研究者列為對象，連認為近來的「對日新思考」是上述文化交流的成果的說法都有。此類文化交流策略的相關議論，亦往往可以適用於台灣。

然而，在上述的文化交流論中，有許多並未考慮到日本是否為殖民統治、或為占領支配地區；該當區域脫殖民地化的過程；及日本本身的脫殖民地化等問題。易言之，日本曾經進行統治及支配的這一因素、及在其地所進行的脫殖民地化過程，當然會與該當區域對日本的認識、日本研究有所關聯，但忽略此點、而對歐美的日本研究「高度」重視的傾向卻存在。這不僅是戰前的支配、統治期，被統治者、被支配者是否可以視為「日本」的問題，也是戰後日本本身的脫殖民地化的問題。

海外的日本研究者、研究機關數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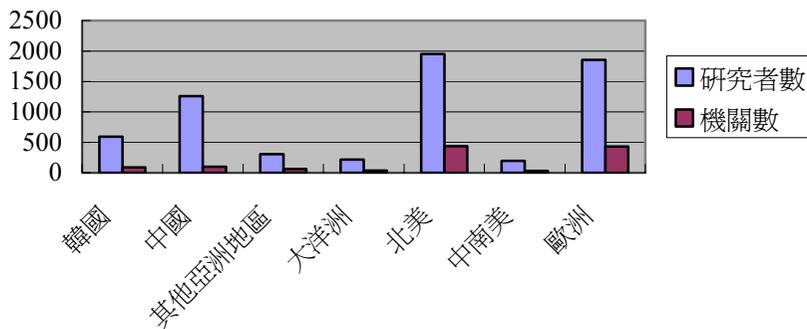


圖 2 海外的日本研究者、研究機關數量（不含台灣）<sup>8</sup>

然而，並不是僅以此便得出歐美優位的結論。不僅是「歷史」及蓄積，或許也是根據研究者及研究機關的數量。圖 2 僅單純標示了研究者和研究機關的數量，但歐美優位的情形卻可一目了然，以此為根據之一，便形成世界的日本研究以歐美為核心的印象。然而，中國、南韓、如果再加上台灣，其研究者的數量大概可與北美、歐洲相匹敵，或甚至在其上，在研究者的數量方面，世界

<sup>7</sup> 參照上註之提言書。

<sup>8</sup> 以[http://www.jpf.go.jp/j/intel\\_j/topics/proposal/pdf/attach.pdf](http://www.jpf.go.jp/j/intel_j/topics/proposal/pdf/attach.pdf)所揭載國際交流基金所作成的數值為基礎，由筆者製表。

的日本研究中心或許可以說是在東亞（雖然在研究機關的數量上可能有所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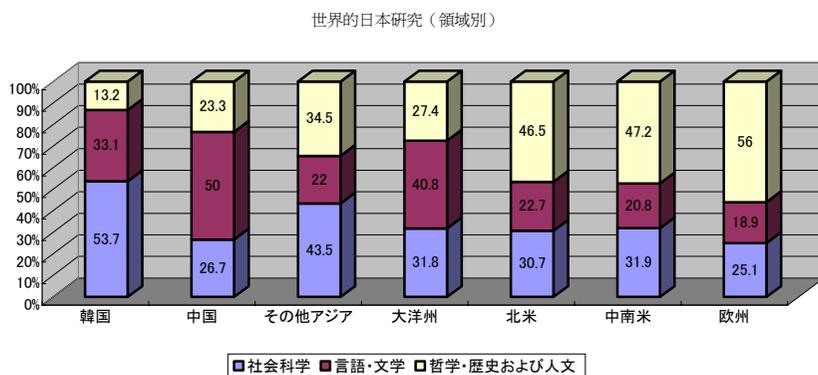


圖 3 世界的日本研究（以領域區分。不含台灣）<sup>9</sup>

接下來以領域為區分觀察其狀況，以內容而言，確實可以發現在歐美，社會科學、語學文學等的研究不多，而較偏向人文科學。並可見語學文學有逐漸減少的趨勢。一般會認為，歐洲的日本研究可被視為已具有「成熟」的理想狀態，而中國在語學文學方面的突出研究、南韓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數量眾多，則被理解為出於其「實踐志向」。然而，在日本統治和支配下的區域由於將「日本」作為政治上的敏感對象，故將處於被管制狀態下的社會科學、及漸從管制狀態下脫離的語學與文學作為研究核心是十分可以理解的。確實如同在台灣所見的，一方面管制開放，研究對象包含人文科學而趨於多樣化，然而由於人文科學十分廣泛，研究尚無法謂為具有足夠的深度。<sup>10</sup>由於東亞諸國與日本平時的交流十分頻繁，故而其重視「實踐」面也是無法避免的。另一方面對歐美而言，由於此類日常接觸有限，故其遵循東洋學及地域研究的傳統知識框架，而往往會重視哲學及思想、歷史，這也是很容易想像的。

根據第 3 章，台灣在研究的內容方面（雖則，在台灣的日本語學、日語教育學作為前提究竟占有何種程度的占有率，尚不十分明瞭），政治外交及經濟管理等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系統幾乎不分軒輊，由此點可認為台灣屬於「大洋

<sup>9</sup> 參照[http://www.jpjf.go.jp/j/intel\\_j/topics/proposal/pdf/attach.pdf](http://www.jpjf.go.jp/j/intel_j/topics/proposal/pdf/attach.pdf)。

<sup>10</sup> 關於漢字文化圈的問題，或因為將日本的哲學、思想、文化等視為中國的追隨者，而使其在東亞難以成為研究對象，這類根本的問題，另於別處討論。

洲」型、或謂與中國持有近似的構造。日語部分的佔有率雖尚屬未知數，仍可認為與中國頗為相近。其在數量上的增加，也可謂與南韓及中國同軌了。若將之置於世界中的日本研究中來看，台灣的日本研究大概還是「重視實踐」，而屬於以語學、文學為中心的「亞洲型」。然而，由於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內容均十分多元，也須再檢視語學與文學研究的內容等，故而以上結論仍有加以檢討的空間。

另一方面，亞洲有以下的一般性傾向存在：以語學文學為中心的地區中，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領域的日本研究將難以取得發聲，同時也無法對世界的日本研究、或國內的學術典範提供衝擊；此即使在台灣也是一共通的課題。在台灣有十餘萬的日語學習者，且 1980 年代後半以來，有一股強大的期待了解日本的傾向，故而提出了數量眾多的碩士論文，但當其進一步成為博士論文時，能夠扣合學術上關心的卻不太多，且社會科學也可謂尚未朝成熟的方向前進。這或許是出於對日本的關心仍是所謂「實踐的」之故。或謂，對日本抱持關心、而以學術形式加以呈現的設施及裝置尚未成形之故。

## 五、台灣作為亞洲型日本研究的「成熟」－與中國的日本研究加以比較中可見－

可以想像在不久的將來，亞洲的日本研究中語學、文學將會減少，而人文科學將會增加。日本統治了台灣 51 年、與中華民國重視「抗日意識型態」等事，已沒有必要再被當作研究環境的背景而加以考慮。<sup>11</sup>並且，在台灣的脫殖民地化過程中認定何謂日本文化的表徵時，已可將武士道等與戰爭有所連結的對象去除，而而另尋有興趣、關心的對象。並且，不限於戰爭前期，在日本本身的脫殖民地化的過程中，從東亞前來的留學生及研究者在對日本史及日本哲學等加以論述一事也是被如此假定的。日本對東亞諸國而言，一方面是發展與近代化的象徵，另一方面，由於其統治與支配，日本也擁有負面的形象，此一狀態在戰後持續了數十年，這也是應列入考慮的重要條件。故而，在與日本的經濟關係中重視「日語」；以台灣文學及戰爭前期的俳句及短歌為基礎開始研究日本文學；同時政治外交此一敏感的部分、與為了經濟、貿易的經濟研究也均有所發展，實可謂為當然的事。若注意到在殖民統治下「文化」是統治和支配的象徵，

<sup>11</sup> 在後殖民 (Post Colonial) 的論述中，主要是對舊宗主國如何看待舊殖民地的視點的討論，而舊殖民地對舊宗主國的研究應抱持怎樣的觀點，則尚待討論。

並且是進行涵攝與差別化的激進工具，則「文化」及人文科學無法立即成為研究對象一事，便是能夠理解的了。支配、統治越是尖銳化，文化與政治的關係便越密切，政治會在文化中尋求優越性及支配、統治的根據，念及此，戰後若要立使其成為客觀的研究對象便有其困難。另一方面，在日本的脫殖民地化的過程中，為使「文化」脫離政治而重新加以定位，在歷史、文化研究方面，即使對日本而言已與戰前揮別並在加以反省，但仍須求得東亞的理解，而尋求彼此的論點共有。

此傾向在中國也有其適用的面向。第一，筆者在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擔任副主任時（2000年），及其後擔任與中心相關的諸委員時（2001-2004年），中心活動的支柱之一即為「中國的日本學」。這樣的想法導源於，即使從日本派去了堪稱為日本大家的專家，且將日本的「日本文學」等領域的學術典範、訓練方法、價值觀原封不動地導入中國，卻與學生無法嚙合，類似的經驗不斷重演而導出了上述想法，中國正在摸索有其特色的、與日本的日本研究不同的「某種東西」。並且也意識到這是與歐美的 *Japanology* 或 *Japan Studies* 有所不同的東西。當然，這是十分難以達成的課題，也不是一件立即可以實現的事，但可視為是對日本模式原封不動引入的排斥。那麼「台灣的日本學」是什麼呢？此可謂是在考慮亞洲型日本研究的未來藍圖時，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第二，此中心設置了語言、文學、文化、社會4個專業。此中心繼承大平學校，<sup>12</sup>故這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其一方面以語言為核心，然實際上，文學（以平安古典與近代為中心）、文化（以思想史與民俗學為中心）二專業則因確實地對中國的視點加以重視，而或可謂已臻成熟。畢業生之中，有從本中心的碩士課程畢業後，在東京大學文學部取得博士，從中國文化的視點出發以源氏物語為研究對象，而以『源氏物語の救済』（張龍妹 2000）得到關根賞的張龍妹等人（現為同中心的助教授）。中國也開始出現可以帶給世界、日本的日本研究界衝擊的日本文學、文化研究。另外，對於社會專業是否應以社會包含「經濟」的形式加以重編，或應新設經濟專業？二方的意見在中國都可謂根深蒂固，此點亦應加以留意。這意味著，日本仍然在「經濟」「發展」等方面被肯定具有正面的意義，故而對日本的文化研究等，便存在「是否有用？」的觀察角度。

---

<sup>12</sup> 1979年大平正芳外相訪問中國時，與對中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同時開辦，為日語教師的研修學校。1980年開辦，五年之間共有597人於此研修。為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的前身。

其「作為實用之學的日本研究」的性格或許在中國也是共通的。相反地或許也有以下面向：「日本」在政治上有其敏感性，不作為「實用之學」便無法存在。基於此，是要接受其作為實用之學的此一側面，或採用歐美型？這一戰略上的考量便有其必要性了。

第三，其「作為實用之學的價值」也有受到動搖的跡象。此為筆者在北京擔任北京大學現代日本課程的講師時所發生的事（2000年4月），當時「學習日本的意義」為何此一問題廣受質問。意即，過去認為日本的經濟發展、近代化是應該學習的對象，然而，日本的經濟發展停滯，且中國正處於經濟發展中的此時，學習日本的意義便必須重新加以檢討了。這或許確實是被定位為「實踐型日本研究、日語學習」的亞洲日本研究所特有的問題。然而，在日本自身也對其身為經濟大國、或文明國家這類戰後以來的自我認同產生動搖的同時，要解決此一問題是相當困難的。這也可謂是日本本身的問題。日本對於本國的自我認同仍為「文明國」及「經濟大國」；在歷史及思想等方面，在脫殖民地化的過程中，也尚待重新建構其與亞洲諸國的關係。因此才動輒認為，唯有歐美國家才有資格解釋日本歷史及文化。無論如何，定位於「實用之學」的學問，基本上會有被現狀左右的缺點存在。此點應謹記。

第四，中國的問題在於從語學邁向社會科學的轉換，以及從碩士進入博士的轉換。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雖有語言、文學、社會、文化的碩士課程，但在進入博士課程時，卻因有「可指導博士生的教授」的資格問題，使語言專業在結果上成為主要的方向。語言專業以外的碩士生在修完碩士課程後，便成為日語教師，或進入社會謀職。如同筆者在《台灣における日本研究》一書中所謂，在台灣雖然碩士論文的數量激增，但博士論文卻產量不豐。意即，以日本研究獲得博士學位者幾乎可謂沒有，或謂：從碩士進入博士、甚至成為研究者的此一生涯形成的途徑仍尚未完整成形（日本語學、日語教育學方面，由東吳大學擔當此工作）。而社會科學系則踏實地、一點一滴地培養了一些取得博士學位者。「日本研究」因此二分為碩士輩出的日文系、與細水長流培養博士的社會科學系。然而，是否如此便可以否定「偏重語學」一事，仍留有疑問。意即，若存在以既有的學術典範等試圖接近日本的模式，則另有以日語及對日本的關心為對象的模式，雙方並存也未嘗不是好事。此也與 Japan Studies 與 Japanology 的問題相關。

另一方面在中國，為解決從語學想要轉換至其他學術領域的困境，也有以

留學日本以為補足的作法存在。然而，此僅指如國費留學生的期間延長等被認可的中國，在台灣同樣作法則有其困難。且因為日本的學術訓練從大學部開始、至碩士課程而終了，博士課程以上，即使留學而來也可能無法受到充分的訓練。故而有某種作法是放棄純粹的日本研究，而將專攻轉向日中關係等。然而即使存在這樣的情形，仍可感受到由於頻繁的學術交流、學生的來往等，狀況逐漸地有所改變。台灣的日本研究方面，也令人感到與日本的戰略的、建設的交流，有成為一種具積極意義的重要因素的側面存在。

## 六、結論：數項建言

戰後，日本與東亞均有「脫殖民地化」的此一共通課題，然而在面對此問題的同時也要迎向 21 世紀。就日本而言，是戰後在四島嶼上形成「日本」的問題，而從東亞的觀點，則是戰後在國家建設中如何重塑「日本」的問題。這是從東亞的日本研究的理想狀態，及其與日本的日本研究的關係中所分析出來的面向。然而，反過來對東亞的日本研究的理想狀態能加以重新考量一事，也是在摸索今後應形成怎樣的關係時，十分重要的事。在此意義下首先必須進行的，是希望能夠描繪出台灣（可能的話從戰前開始）戰後的日本研究狀況，作成文獻目錄等的這類基礎工作。當然，以上作業希望從日本方面取得支援。此時，筆者所作成的資料希望能夠成為其出發點。<sup>13</sup>此為第一項的建言。

從將「台灣的日本研究」置於「世界的日本研究」中的觀點出發，則希望發掘台灣的日本研究的特徵、特色，憑此向世界發出訊息。如上所述，台灣既擁有與東亞相同的日本研究的諸特徵，同時也在日本統治及中華民國統治的面向上有其歷史的特殊性。雖則環境決定論並不是萬能的，但在考量全世界的日本研究時，台灣的日本研究擁有許多應該加以考察的面向，此點是不變的。這是第二點的建言。

其次，在日本與台灣的關係方面希望能夠有雙向的文化交流。並非由日本單方面地支援台灣的日本研究，而台灣也能夠對日本提供建言。<sup>14</sup>例如較諸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及統治、支配責任，以及戰後日本的脫殖民地化等，無法在

---

<sup>13</sup> 日本的台灣研究作為日本台灣學會活動之一環，掲載於交流協會網頁。  
<http://www.koryu.or.jp/center.htm>

<sup>14</sup> 對交流協會事業的具體建言如，教育部獎學金從去年開始，不再將短期留學生（大學之間基於交流等的交換留學生）列為對象，這對日本而言是一大打擊。

日本國內進展之議題。然而，與其說文化交流是在沙漠澆水（喻毫無用處），應該是可以期待其達到可見的效果的。要達到「有效果的」「有用的」的程度雖有其難處，但在基礎建設的整備與人材養成、在某種意義上達到水準方面，則可認為比較有其意義。從而，對可擔保一定的多樣性的制度、與可使「效果累積」的據點的形成的要求，便是十分平常的事了。到目前為止日本透過交流協會，展開了補助留學生、支援日語教育、支援專家等工作。日台交流中心的歷史研究者交流研究員補助、基礎建設的整備與人材交流等方面雖然幾乎可謂取得了空前的重大成果，然而次年度之後，其是否能夠繼續作為據點而發揮機能，卻無法獲得保證。在此意義上，日本與台灣雙方最好能形成某個據點。即使在海外的日本研究中，此據點應該也能成為台灣的日本研究的「表現」吧。此為第三點的建言。<sup>15</sup>

最後為第四點的建言，為了進行日本研究，可以對堪稱為基礎工作的「台灣的日本學學習、研究、資訊之資源」等研究計畫加以著手進行，在此希望提案由日本方面進行補助。此不僅指教育工具，文獻檢索、研究目錄、乃至於留學資訊等，均希望可以經由網路獲得。則交流協會便如同豐田財團般，將由大學相關者等組成的計畫決策組織加以有機地組織、與台灣方面的據點聯絡，而同時，推行基礎建設的整備也是很重要的。

## 參考書目

川島真。2000。〈日本政府の対東アジア文化交流政策の現状と課題：「北京日本学研究所センター」を事例として〉。徐興慶主編，《第一屆日本研究臺日關係日語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7-61。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日本研究所。

\_\_\_\_\_。2001。〈方法としての台湾〉。東アジア文史哲ネットワーク編，《小林よしのり「台湾論」を超えて—台湾への新しい視座—》，頁 42-54。東京：作品社。

\_\_\_\_\_。2002a。《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研究》。東京：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sup>15</sup> 使獎學金制度可容易地從 2 年加以延長、留學之際設置日本研究的範圍、或形成派遣專家到台灣的據點等，是可加以考量的。此時，在一方面以日語學習大量集中的日語系、日本研究為核心的同時，另一方面也可求得對培養博士的社會科學系及自然科學加以關照。

- \_\_\_\_\_。2002b。〈戰後台灣における日本研究動向と中国の比較に関する一考察〉。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主編，「大學日文教育與社會結合度」國際研討會。台北：大新書局。
- \_\_\_\_\_。2003。〈台灣の日本研究〉。《アジア遊学》，48：164-169。
- 谷口龍子。2001。《台灣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事情調査報告書 1999(改訂版)》。東京：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 徐興慶。1999。〈現代の台灣における日本研究〉。《天理大学学報》，190：129-150。
- \_\_\_\_\_。2000。《我国的日本研究現況及其未来展望：兼談中国大陆及韓国之日本研究現況》(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演講系列 2)。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計畫。
-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1998。《台灣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事情調査報告書(改訂版)》。東京：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 張龍妹。2000。《源氏物語の救済》。東京：風間書房。
- 黃自進。1995。《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與評價 1906-193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_\_\_\_\_。2001。《北一輝的革命情結：在中日兩國從事革命的歷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劉長輝。1997。〈台灣における日本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日本学報》，第 39 號。漢城：韓国日本學會。
- 蔡茂豐。2003。《台灣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上・下)》。台北：大新書局。
- 嚴安生。1991。《日本留学精神史》。東京：岩波書店。